

族际关系中张力的来源与消解

——兼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启示

郝亚明

(贵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全面梳理相关领域文献可以提炼出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四种主要理论假说。“文化差异说”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认为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利益竞争说”着眼于政治经济层面,认为族际冲突的本质是围绕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竞争;“结构区隔说”着眼于社会结构视角层面,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安全困境说”着眼于国家对族际关系的掌控能力,认为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以特定民族政策对诸多张力来源进行有效回应,另一方面也必须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对多元张力的超越。

[关键词]族际关系;族际冲突;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21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团结就是生命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但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团结大局依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因素与阶段性问题的挑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民族工作“五个并存”的特征总结就非常形象具体地阐明了这种态势。^[1]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先后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民族工作方略,无不是着眼于

调节民族关系、巩固民族团结。要达成协调民族关系的政策目标,首先就必须从学理上搞清楚族际关系中张力的来源,并据此来探寻张力化解的实践路径。

就族际冲突的形成原因而言,传统意义上有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等若干主流解释范式。随着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统计分析等现代社会科学实证方法的运用,当前关于族际冲突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前述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与对垒。最新的研究“直指族群冲突背后的深层因素,即国家建构、国家内部权力斗争和

政治统治,或是将深层因素与各类情绪等直接因素结合起来讨论”。^[2] 例如有学者将恐惧、仇恨、愤怒和不满等情绪因素视为直接因素,将政治制度、不平等、统治和排斥等作为深层因素,以“安全困境”和“族间一族内互动”作为整合机制,构建出一个广义的动态的族群冲突理论。^[3] 这种研究取向无疑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综合考察了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和国际因素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对于解释和预测族际冲突的发生发展具有较高的效度。然而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复杂模型将族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与条件糅杂在一起,并不利于清晰呈现族际冲突的根本动因。对族际冲突根源的探讨,仍然有必要回归到民族现象本身。事实上,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建构主义这些解释族际冲突的理论视角,原本就是关于民族现象自身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范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族际关系与族际冲突的理解,终究离不开对民族本质与性质的理解。基于这一分析思路,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几种主要假说,在此基础上简要阐述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启示。

一、文化差异说

所谓“差异说”,意指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族际差异导致族际冲突的观念,在古今中外都极为普遍和流行。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远古表述,到亨廷顿关于各种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现代论断,^[4] 都是其典型代表。一些学者将族际差异导致族际冲突称作“先入为主的观念”,既指出了这种认识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也说明这种认识是很多人头脑中关于族际冲突动因的首要解释。

民族现象的复杂性众所皆知,民族概念上的歧异与纷争就是这种复杂性的集中体现。法国著名学者德拉诺瓦指出:“民族是存在的……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5] 霍布斯鲍姆则更

是断言:“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6] 由于难以直接把握民族现象的本质,现有民族界定基本上都选择以要素列举的方式来描摹民族的轮廓。例如“客观标准派”强调民族形成中的客观因素,如血缘、地域、宗教、语言、风俗和制度等;“主观认定派”则强调认同、情感、想象、行为及其他精神性因素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通过强调在这些主客观要素上同一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边界得以确立。由于族内认同与族外认异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久而久之,族际差异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传统意义上,民族就是指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的各个人群共同体。

族际差异与族际冲突之间理论链条的建立是通过“族群性”(ethnicity)这一概念来完成的。唐世平在分析族群性这一概念时,指出其包含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族群性意味着“基于一系列如语言、文化、历史、地区和外貌等共有特征而产生的对共同起源的感知”;其次,同族裔的成员常常会赋予这些与族群性息息相关的共同特征更深的含义;再次,这种共同体或群体意识可能会提供集体行动的基础。^[7] 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族际关系的内在逻辑——无论是特殊意义的赋予,还是集体行动的生成,都必须以族群性的感知为基础。李峻石将“族群冲突的原因在于族群性”这一论点分解成六条立论:(1)文化差异即族群性,是族群冲突的原因;(2)文化碰撞反映了古老的、世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对立;(3)族群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一族群;(4)族群性具有先天归属性,这意味着在常规情况下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族群归属;(5)族群是一个具有共同祖先的群体;(6)族群具有地域性,一个族群会争取一个统一的领地,最终争取民族的独立主权。他认为,后五条与第一条相辅相成,增加了族群性的分量,最终形成一个能引起或者加深冲突的因素。^[8]

差异说在族际冲突中的解释力一定意义上

与原生主义存在紧密关联。原生主义强调民族是人类的自然单位,语言、血缘、习俗、宗教、地域等原生纽带将民族群体凝聚在一起。“有机论原生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划分为众多的民族,各个民族都是有着固定界限且相互独立的有机实体,个体的民族身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社会生物学原生主义”认为,民族是具有血缘联系的文化群体,人类对于血缘大家庭根深蒂固的自然感情转移到了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象征的共同体之中。“文化原生主义”认为,人们对于族群和民族具有天生的依恋情,这种依恋具有非常强大的激情和持久性。^[9]在原生主义的视野中,族群性被认为是历史性、文化性、情感性、生物性的混合,是先天的、自然的存在,其强烈的排他性蕴藏着族群冲突的危险。对于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主客观差异,原生主义将其本质化、神圣化,营造一种民族群体之间差异不可调和的论调,对于强调族际差异导致族际冲突的观念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尽管不少学者强调原生论已经遭到了学界的抛弃,^[10]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在“学界、政界和媒体界都有广泛的市场”,^[11]还有学者认为带有原生主义性质的差异说是大众媒介与政治精英的普遍信仰。^[12]

差异说作为族际冲突的文化解释范式,紧扣民族现象的表与里,突显了族际冲突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相当的理论洞见。同时差异说也存在诸多学理与经验上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族际差异必然导致族际冲突吗?现实表明,差异同样可以带来融合与共存的可能。随着族群身份建构性、变动性、场景性理论的不断崛起,原生主义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族际差异导致族际冲突的学理基础已经被动摇。其二,在经验研究领域,族际冲突的激烈程度与族际差异的大小程度之间并未显现出正相关关系,低差异—高冲突以及高差异—低冲突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在非洲国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最为同质的索马里,国内长期陷入高度分化、高度暴力对抗的内战局面;与其相邻

的国家肯尼亚,族群与语言极为多元,却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13]其三,差异论将族际差异视作族际冲突的根源,必然导致试图淡化或消减族际差异的同化主义实践倾向。原生主义作为差异说的理论支柱却带来了实践中的悖论,它倾向于以淡化族际差异来应对族群冲突,同时又暗含着淡化族际差异的无效性,以及潜在在其中的巨大风险。因为一方面人们会努力去保存、创造、编制自己的族群象征符号,另一方面还会触发认同威胁及抵抗性认同,从而引发更加激烈的族际冲突。

二、利益竞争说

所谓“利益说”,意指族际冲突是由政治经济利益竞争所形塑的。不管以何种“高贵诉求为理由和目标的战争,其背后隐藏的本质性争端都关乎实际利益,它们或者是矿物资源,或者是从业领域,或者会涉及官职、报酬等”。^[14]在某种意义上,利益说是对差异说的一种反动,它直接否定族际差异导致族群冲突的观点,甚至进一步提出由利益竞争导致的族群冲突催生了族际差异与族群边界。“族群独特的血缘、历史与文化特征并非族群的本质,而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才是族群构建的根本动力。”“族群之间的社会张力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更是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15]如果说差异说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情感体验的色彩,那么利益说则具备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认知的特征。利益说建基于大量的质性案例研究以及量化统计分析,它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族际冲突研究的深入化及精细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理性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对族际冲突研究的深刻影响。尽管差异说长期被认为是族际冲突的正统解释范式,但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利益说的影响则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16]

利益说带有建构主义族群观的理论色彩,但更本质地说,它是工具主义族群观的集中体现。

工具主义指的是族群身份、族群认同、族群边界都只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利益竞争中所使用的一种动员工具。“工具主义基本上把族群视为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工具主义把族群性视为个人、群体或精英为实现某些更大的尤其是物质性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工具。”^[17]“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18]对于族际差异与族际冲突的关系,利益说认为前者并非后者的原因,而是后者的结果。而族际文化差异一旦形成与固化,又作为工具被利用来参与利益竞争。

利益说中的“利益”通常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围绕这两个领域分别形成了精英操纵理论(Elite Manipulation Theory)与资源竞争理论(Resource Competition Theory)。精英操纵理论认为,族群性仅仅是用于获取政治优势地位的标签或纽带,是帮助族群政治精英达成其政治目的、实现政治利益的一种工具。“族际暴力冲突是被政治精英所挑起的,旨在营造族群性是唯一具有政治意义的身份认同的国内政治环境……以族群受到威胁的名义来获取个体利益,处于危机中的精英既可以摆脱国内挑战者动员民众反对现状的困境,也可以在应对未来挑战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19]对族际冲突的操控,既可以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来完成,也可以由少数族群的政治精英来推动。相对而言,资源竞争理论专注于经济因素尤其是自然资源争夺对族群冲突的影响,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热点。研究发现,一旦出现大量可供争夺的自然资源时,族群冲突乃至战争就很有可能随之而来,水、石油、天然气、草场、钻石、黄金乃至是毒品都可能会成为世界各国族群冲突爆发的原因。^[20]

利益说强调了族群性中建构性、场景性、变动性与工具性的一面,利益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族际差异对族际冲突解释力的不足。利

益说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其自身同样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弱点。首先,利益说过于强调工具理性的作用,而低估了情感性因素的力量。“这种类似‘经济人假设’的工具理性纵然有着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却通常会在解释情感、价值观和群体行为等问题上陷入某种认识论上的困境。”^[21]现代社会科学深受理性人假设、理性行动理论的影响,然而民族本身却是一个蕴含着情感、认同、价值、观念等非理性因素的领域。因此在充分认识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涉入民族问题研究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对其所持有的假设和前提抱有高度的警惕。其次,利益说片面强调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对族群行为的驱动作用,有将族群庸俗化为一般性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的倾向。事实上,如果不援引历史因素与文化因素,不借助族群性、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等概念,利益说就无法圆满解释为何族群精英能够成功操控民众以及为何民众愿意接受族群精英操控,也无法解释围绕自然资源的竞逐行为为何会沿着大致固定的族群边界展开。

三、结构区隔说

“差异说”是一种历史文化视角的解释范式,将族群历史文化差异与族际冲突关联起来;“利益说”是一种政治经济视角的解释范式,将族际冲突归因为围绕政治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而“区隔说”则属于一种社会结构视角的解释范式,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区隔说注意到一个现象,不管是出于文化差异,抑或是出于利益竞争,冲突的边界经常与族群的边界相重合。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政治、经济竞争,仅仅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断裂自身就足以造成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区隔说并不否认文化差异或利益竞争对族际关系的影响,但认为族际冲突发生的内因还是在于族际社会结构的断裂与族际边界的固化。在多民族国家中,“失衡的民族结构与脆弱的民族关系成为最

有可能撕裂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事务方面的群体分歧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层面,并最终在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22]例如,尽管学者们在民族关系张力是否是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论,但苏联在历史与现实、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挑战最终聚合在民族因素上爆发,致使强大而统一的联邦共同体裂解成15个独立民族国家的事实却是学界公认的。^[23]

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现象可谓是区隔说绝妙的事实例证。在历史上不少西方国家的民族结构较为简单,随着近代以来的人口全球性流动,这些国家在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不断加深。在经济限制、文化偏好、制度选择、社会压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国家在走向多样性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族际区隔的趋向。不同族群在居住、社交、消费等社会生活场景中呈现出明显的族际区隔,此种现象在教育 and 就业场域中也有所蔓延。“平行”原义指的是两条直线永不相交,西方学者创造出“平行社会”的概念,用来描述这种多民族社会里不同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族裔群体之间互不交往的情形。^[24]随着此种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少数民族对主流社会的疏离感日益强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陌生且排斥,各种妖魔化、刻板化的印象日益固化,不仅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共同体意识,而且还会导致群体冲突乃至社会分裂。“区隔通常被视作引起分裂与不和的重要因素,它阻碍了社会交往并导致群体之间相互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25]从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普遍性的居住隔离与长期性的种族对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移民、难民聚居区所爆发出来的骚乱行动,都是此类社会结构区隔的恶果。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则从某种角度上为区隔说提供了理论支撑。佩蒂格鲁将族际接触促进族际关系的主要作用机制总结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维

度。^[26]首先,族际接触可以增进彼此了解,通过接触习得的新知识修正对外群体的负面认知,进而改善族际关系;其次,族际接触可以显著减少群际威胁和交往焦虑,缓解因焦虑感带来的消极心理反应,从而促进群际关系的积极发展;再次,族际接触可以促使人们采取外群体的视角去感知世界,从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发展积极的族际关系。区隔说基于此指出,族群边界固化与社会结构断裂的一个重要负面影响,就是妨碍了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顺利进行。“如果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能够自由而真诚地交往,那些紧张与困难、偏见与困惑,都会消失;如果人们不能彼此交往而是相互隔离,那么偏见和冲突就会像疾病一样疯狂生长。”^[27]

区隔说并不直接否定差异或利益导致冲突的存在,因为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角来看,内外群体的区分、族群差异的存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竞逐,的确可能导致冲突产生。但区隔说认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族群差异以及族群利益才会导致冲突,那就是族际之间社会结构的断裂。在多民族社会文化差异与利益竞争总是会客观存在的现实之下,区隔说提出了从社会结构相互嵌入的角度来解决族际冲突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就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果能够通过社会结构的嵌入,使得族群边界更加流动或呈现重叠,那么即使有文化差异或利益竞争,也不一定会发生族群冲突。

四、安全困境说

“安全困境说”源于国际关系学科,现已发展成为当代族群冲突领域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原意是指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自身安全,由于战略意图的高度不确定性,极易引发他国作出针锋相对的政策回应,从而导致国家陷入到安全困境之中。罗伯特·杰维斯指出,一个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行为必然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家往往通过增强军备减弱自身

的不安全感,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军备。结果就会出现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后是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强了军备而感到更加不安全。^[28]唐世平将这一过程概化为“无政府状态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导致恐惧——恐惧产生权力竞争——权力竞争引发潜在的安全困境——被激活的安全困境通过螺旋式发展导致战争”的因果链条。^[29]“安全困境的悲剧性在于,它所导致的战争并不是任何参与方所希望的,反而是参与方的安全需求导致了他们本想极力避免的战争。”^[30]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进程中,随着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权的崩溃,一些国家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迅速催生了激烈的族群对抗乃至引发国家分裂。这一现象启发国际关系学者将“安全困境”的概念引入到国内族群冲突领域,巴里·波森 1993 年的研究被认为开辟了相关研究的先河。^[31]由于很多国家的族群冲突与国内(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如影随形,因而安全困境说逐渐成为理解族群冲突的重要理论视角。“国家中央权威的崩溃或功能退化造就了国内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内各个族群对自身的安全高度敏感……一个族群维护安全反而导致包括该族群在内的所有族群均变得更不安全,从而形成了族群安全困境。”“在族群安全困境下,以前曾经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和平共处的群体突然开始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彼此,把彼此的每一个行动都视为威胁。”^[32]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族群冲突的发生。

然而,仅以外在的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国内族群冲突的发生并不圆满,安全困境说的支持者尝试将内在因素尤其是族群心理引入到分析模型之中,探讨两者的联合作用。这无疑是一种睿智的思路,因为“安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感受,而安全困境的成因及后果都与群体心理有着紧密而深刻的关联。例如唐世平教授将“不满”“仇恨”“恐惧”等心理因素引入到安全困境的族群

冲突模型之中,认为心理因素在从安全困境到族群冲突的因果链条中,起着重要的关联或调节作用。^[33]然而这一理论模型仍未充分发掘族群心理的解释意义,原因就在于作者认定心理因素既不能引起安全困境,也并非维持安全困境所必须的,而只是安全困境严重程度的调节者。“安全困境在起源上是结构性的,竞争的自主无政府状态才能产生安全困境。”^[34]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族群都会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安全困境,在心理上充斥着“不满”“仇恨”“恐惧”的族群之间才更有可能产生零和博弈。作者在正确指出族群心理状态对安全困境调节功能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两项潜在功能:一是特定群体心理可能会催生安全困境;二是安全困境也可能恶化群际心理状态,从而作用于最终的族群冲突。可见,安全困境这一聚焦于宏观权力结构的理论学说,深深植根于群际心理的脉络之中。

总结而言,在安全困境说看来,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恐惧、仇恨、不满、怀疑等心理因素发挥着多层次的作用。来自巴尔干半岛、西亚、非洲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案例都有力地支撑着这一理论的解释力。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正是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为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等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而,“化解族群冲突的根本途径是重塑中央权威,消弭族群安全困境”。^[35]然而,强化中央权威与消解族群冲突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导致少数民族的抵抗性民族主义,进而导致国内民族关系恶化的案例同样并不鲜见。例如宁骚教授就提出,正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强化中央权威)导致了当代世界国内民族冲突的普遍发生,因为民族国家建构与族体自身发展之间存在矛盾。^[36]民族国家建构追求打破壁垒、强化统一,一旦在国家制度与民族政策方面出现偏颇,如国家权利垄断、语言和文化的同化、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失衡,就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族际冲突。此外,威尔·金里

卡在探讨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时谈到了“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概念。他指出:“当国家感到存在地缘政治危险或者对周边的敌人感到恐惧时,它们不可能公平地对待国内的少数群体。”^[37]族群关系一旦被安全化,就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国家会采取很多限制性措施以捍卫自身。只有在去安全化的条件下,族群政治才可能回归日常政治。

五、小结:兼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启示

要有效调控民族关系,首要前提是对族际关系中张力来源有清醒的理论认识。本文通过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全面梳理,提炼出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四种主要理论假说。“文化差异说”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认为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利益竞争说”着眼于政治经济层面,认为族际冲突的本质是围绕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竞争;“结构区隔说”着眼于社会结构视角层面,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安全困境说”着眼于国家对族际关系的掌控能力,认为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族群心理因素也起到了关键性的调节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有效调控民族关系必然是其题中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族际关系中张力来源与化解的理论探讨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在第一个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注重对族际关系中诸多张力进行有效回应。张力的存在可以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方向,张力的消解应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抓手。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各项民族工作方略的针对性作用与协同性作用。针对文化差异说,中央提出了构建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针对利益竞争说,中央提出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针对结构区隔说,中央提出了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针对安全困境说,中央提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保持民族政策体系整体延续与适时调整两者间的平衡。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方略自觉呼应了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系列理论范式,也从侧面证明了其科学性的一面。这些民族工作策略在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民族政策体系,共同调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程。

在第二个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超越对族际关系中诸多张力的简单回应。从上文四种理论假说来看,族际关系张力的来源非常广泛,涉及历史文化差异、政治经济竞争、社会结构断裂、国家能力衰退以及群体心理对抗等诸多因素。这一事实深刻彰显了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治理的复杂性,因为在多元民族结构之下,不同领域的因素均可能演化为族际冲突的肇因。尝试构建指向明确的民族政策体系以直接应对各种族际关系张力固然十分必要,但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共同体意识”才是化解上述多元张力的根本所在,只有在各民族间真正培育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身份共同体的意识,才能从本源上消解族际关系中的张力。如果说针对特定张力来源制定民族政策属于治标的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属于治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由其自身作为根本性民族工作方略的地位决定的。在当前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必须确立这样一种理念,即对民族关系的调节、对民族团结的创建,都应该以培育共同体意识为中心。

注释:

[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

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2][7]唐世平、王凯：《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欧洲研究》2018年第1期。

[3]Shiping Tang,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3, No. 3, 2015, pp. 256 - 279.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5][法]吉多·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页。

[6][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5页。

[8][12][13][14][德]李峻石：《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吴秀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15、4-5、4-5、22页。

[9]参见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54-56页。

[10]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and Ethnic Conflict”,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91.

[11][17]焦兵：《族群冲突理论：一种批判性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5][18][21]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16]现代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更加支持利益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主观性的文化差异与族群情感，客观性的资源或利益竞争更易于被测量和感知。

[19]V. 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1994/95, p. 132.

[20]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0, No. 4, 1998; 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1.

[22]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3]潘广辉、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

[24]Mueller C., “Integrating Turkish Communities: A German Dilemm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 25, No. 5, 2006.

[25]Peach C., “Good Segregation, Bad Segregation”,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 11, 1996, p. 379.

[26]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pp. 65 - 85.

[27]Bramfield T., *Minority Problems in the Public Scho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6, p. 245.

[28]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 - 214.

[29][34]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

[30][32][35]焦兵：《族群冲突：基于安全困境的解释》，《国际论坛》2014年第3期。

[31]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 35, No. 1, 1993, pp. 27 - 47.

[33]王凯、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

[36]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加]威尔·金里卡、焦兵：《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衰？关于多样性社会中接纳和包容的新争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